

毛泽东诗词的伟人情怀

□康震 王毅

王毅:曾在一次课堂上听到你讲毛泽东诗词的伟人情怀。这是你在军内第一次讲毛泽东诗词吧?有什么感想?

康震:我虽然没有当过兵,但是我对于军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崇敬感,因为军队保家卫国,军人牺牲奉献,这不论在哪个时期,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有何种信仰,也不论处于哪种政治体制,军队军人都是诗词歌赋表达的重要对象,永远值得人们真心热爱拥护。到部队交流毛泽东诗词,除了基于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希望我个人能为人民军队在向现代化进程的征程中,献出自己的一点微薄力量。

我们这几代人,都是学毛泽东的诗词长大的,像《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都是中学时必读必考的名篇。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思想家、天才的军事家,也是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书法家,更是一位才华横溢、极具浪漫主义的诗人。毛泽东诗词艺术地记录了他一生的光辉足迹,生动展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画卷。柳亚子先生曾夸赞毛泽东诗词:“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智利著名诗人曼鲁达则赞誉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追踪伟人毛泽东的成长足迹,寻觅诗人毛泽东的创作道路,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一生奋斗,一生革命,一生逐梦,因而一生有诗。这是一个伟人的梦,这是一个诗人的梦,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世纪之梦。

王毅:诗人是最具有梦想的一类人,毛泽东的梦想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梦吗?

康震:毛泽东的中国梦,虽然和现在表述不一样,但其内核意蕴是一致的,是天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伟大复兴之路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中国梦,可以从他的诗词中读得出来。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天翻地覆慨而慷”,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到“六亿神州尽舜尧”,从“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从“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到“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阕”,等等,都深刻融入了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梦想。

王毅:苏轼《和董传留别》曰:“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毛泽东的诗词是他伟大抱负的写照。

康震:是的,毛泽东诗词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写照,也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境界,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化精品。它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必将激励我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强军梦征程中,恪守初心,砥砺前行。

王毅:请您具体谈谈,毛泽东诗词蕴含了哪些优秀文化和革命精神?

康震:毛泽东同志一生共创作了100多首诗词,他的诗词与历史现实紧密结合,展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恢弘画卷。欣赏学习毛泽东诗词,就不得不提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的民族情怀、政治情怀、人民情怀、山水情怀。毛泽东诗词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诗词思想深刻、意境高

远、博大精深,不仅高度浓缩了毛泽东的人生追求、伟大实践和深邃思想,而且也艺术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多样和勃勃生机。无论是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政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以书为伴,博览群书,近乎痴迷。

王毅: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情有独钟,涉猎的诗词作品遍及历朝历代,可谓博闻广收,兼采众长。

康震: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广,对古典诗词烂熟于心,在文章、报告、书信、谈话、题词中,为说明观点、论证事理、表达感情,均能够信手拈来、出口成章,处处彰显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卓越的诗人才华。比如,历代咏梅诗作不计其数,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绝妙佳作。陆游词中的梅花在凄风苦雨中遗世独立、孤寂冷漠、消极退缩、凄凉愁苦。毛泽东则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一“俏”一“笑”令人耳目一新,泛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

王毅:他的诗词处处都流露出革命浪漫主义。

康震:毛泽东诗词的背后,是对中国革命的浪漫乐观主义。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艺术结晶,真实映射了毛泽东的革命生涯,是中国革命史的壮丽画卷,是解读革命文化独特而珍贵的范本。比如《七律·到韶山》,清晰阐释了革命目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首七律,是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时写的,虽然写的是韶山,但实际上也概括了当时的中国,中国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才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高度评价了革命人民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鲜明体现了毛泽东高远的革命情怀。

比如《七律·冬云》,豪迈展现了“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革命精神,英雄豪杰面对虎豹熊罴,志不可改,气不可夺,越是面对困境越能显示出他们的英雄本色,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革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辉煌辉煌,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坚定执着、视死如归、不惧艰险、勇于担当、乐观豪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

王毅:毛泽东的这些诗词,读起来很提气。

康震:还有人们都很熟悉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不朽的金句。毛泽东孜孜不倦,上下求索,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他一生最伟大的历史功绩。1927年的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危局中奋起,毅然发动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王毅:虽然历尽沧桑,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康震:是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解放意味着中国革命已经胜利在握,中国革命沿着井冈山道路这条人间正道,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诗词中,苦难与辉煌、艰险与自信经常是同时出现的。像《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首词前阕描写红军拂晓时向娄山关进军,后阕描写红军攻占和越过了天险娄山关。作者自注,“万里长

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王毅:毛泽东写诗好像是局势越严峻诗兴越浓,处境越艰难创作越多。

康震:是有这个特点,从《西江月·秋收起义》开始,毛泽东就告别“书生意气”,转入战争纪实,“炮声”“枪林”“鏖战”“弹洞”等词汇频繁出现。如《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设身处地试想,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危急形势下,能做到“我自岿然不动”,这得具有何其惊人的定力和自信。从创作缘起、描述对象到思想内容,均真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民如火如荼的斗争风貌,艺术勾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历史长卷。在《清平乐·会昌》中,毛泽东意气风发:“踏遍青山人未老”,透露其坚定的革命精神和他对挽救危局、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强烈自信。在《七绝·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中,“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这种“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伴随着毛泽东的革命历程和艰难困苦的斗争生活,展现在他指挥若定的战斗诗篇中。

王毅:学习毛泽东的诗词,对我们当下有什么意义?

康震:对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坚定道路信心、坚定文化自信,都是有意义的。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他思想博大精深、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始终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众志成城”“只争朝夕”等毛泽东诗词中的词句,有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和理念追求,可以使我们提升思想境界,磨砺品质意志,陶冶精神情操,给予我们奋发向上的力量。

王毅: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史诗,传递的是生生不息的民族和时代精神火炬,是我们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教材。

康震:对我们坚定自信也非常重要。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这首词所传递给我们的力量是,要始终坚定革命理想,振奋革命精神,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提出的号召和历史之鉴。

王毅:提到自信,当下不得不提文化自信,可有一些人总认为西方的月亮要比中国的圆。

康震: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四个自信”,并在党的十九大上将其写入党章,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诗词既采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康震(右)与王毅

文化精华,又浸润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充分彰显,是文化自信的鲜明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毛泽东诗词中的语句。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引用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作《十六字令三首·其二》中的“倒海翻江卷巨澜”;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引用了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等等。毛泽东诗词无论是内容素材还是审美风格,都很好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气象气度与美学精神,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王毅:你认为军队和军人如何学习毛泽东诗词?有什么建议?

康震:军人尤其是青年官兵是军队的有生力量。通过学习研究毛泽东诗词,追寻其学习经历、革命实践,以及对军内外、国内国际大事要事的认知态度和应对行为,可以坚定理想信念,引导他们积极向上,端正学习、生活、工作、训练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奋斗观。我建议,学习毛泽东诗词,不但要认真咀嚼品味蕴含其中的深刻内涵,更要全面汲取吸收蕴含其中的精神力量,要树立“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远大抱负,要培育“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战斗精神,要磨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顽强意志,要培养“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乐观自信。

王毅:这四点总结概括得太到位了,非常贴近部队、贴近官兵。真可谓:中华经典诗文,让我更有力量!

康震:有梦想易,坚持梦想不易。军旅追梦的历程注定不可能一马平川,每个人都都将面临岗位平凡、工作乏味、生活单调、训练苦累等考验。但不管面临怎样的艰难困苦、坎坷波折,广大官兵只要认真学习毛泽东诗词气度,领悟毛泽东思想精髓,就一定能把握好自己的军旅征途,担当起当代军人的历史重任,为新时代强国梦强军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随着弗兰科·莫莱蒂“远读”(Distant Reading)概念的提出及其在英语世界所引发的广泛讨论,另一个与之相伴而再次受到关注的文学研究范畴就是“文学类型”。众所周知,自英美新批评蔚然成势以降,“文本”的概念被提升至空前重要的核心地位,“文学类型”则滑落至相对边缘的位置。而德里克斯蒂娃的“互文本性”、热奈特的“隐迹稿本”、罗兰·巴特的“织物”等理论的相继提出,以及后现代书写中的各种文本拼贴、文本游戏和文本实验,学界对于“文本”的认识和讨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当复杂且动态、多元的层面。

但莫莱蒂对此并不很以为然,他认为文类与技巧才是形成文学史发展的主要力量。莫莱蒂这种文学观念的形成,一方面固然和巴赫金、普罗普、托多罗夫、詹姆逊等人在“文学类型”研究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这也和莫莱蒂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与“远读”方法的提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逻辑闭环。在莫莱蒂看来,现在的文学史书写更多是由经典“文本”构成,这很大程度上是学院与精英们的学术话语体系与审美趣味所致,而在历史上真正的文学生产与阅读场域中,则有着数量远超于经典文学文本的非经典作品存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玛格丽特·科恩称这些作品为“大量的未读”——并指出基于这些大量作品及其宏观发展态势的整体性研究才是理想中的文学史研究,否则文学史不过是一个“文学的屠宰场”。而对待这些凭人力阅读难以穷尽的“大量的未读”时,莫莱蒂提出了“远读”的研究策略,并借此形成了对传统“文本”研究中的“细读”(Close Reading)方法的某种反拨。相比于“细读”中“close”语义学上天然带有的封闭性特征,“远读”在强调其距离感的同时,也必然要求宏观与整体的观察视角。而莫莱蒂对于文学史中“大量的未读”的重视,对“世界文学”宏观发展态势的把握以及“远读”方法论的实践,都内在包含了其对于“回归文学类型”的研究诉求。

莫莱蒂这种“去经典化”和对文学宏观发展态势的把握等研究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触碰到类型文学研究的核心要义。陈平原教授总结《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一书的写作方法和研究心得时曾说到:“我论述的重点不在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的功过得失,而是整个小说史的发展线索;给这

一段小说‘定位’,描述其前后左右联系,确定其在整个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就要突破过去小说史写作的框架,不再是‘儒林传’‘文苑传’的变种,不再只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而是注重进程,突出演变的脉络。在描述小说发展线索时兼及具体作家作品,但不为某一作家作品设专章专节。”据此,陈平原教授自言“给自己写作中的小说史定了十六个字:‘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陈平原教授所说的“消解大家”在莫莱蒂那里正是他所谓的“去经典化”,而“注重进程”则和莫莱蒂重视“大量的未读”以及对文学宏观发展态势进行整体性把握的主张不谋而合。东西方两位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路径(一位是从某一段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出发,另一位则是从宏观的文学史构构出发)进入到类型文学的研究领域,并最终在核心研究思路 and 观点上达成了某种有趣的共识。

需要注意的是,陈平原教授所说的“消解大家”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补充强调的那样:“‘消解大家’不是不考虑作家的特征和贡献,而是在文学进程中把握作家创作,不再列专章专节论述。”陈平原教授在这里不仅是在对自己的著作书写方式做一个总结和自白,更涉及对于文学类型与代表性文本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借用法国学让·玛丽·谢弗的说法,“类型关系始终是某一特定文本与先前的某些作为模式或规范的文本的复制和(或)变异的关系,在这种程度上,类型复制才可能在超文本关系的领域中构成。”(《文学类型与文本类型性》)即同一文学类型中存在“作为模式或规范的文本”,而其他文学文本则与之构成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关系。但这里呼之欲出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那些在类型文学中成为“作为模式或规范的文本”,何以获得市场认可与影响力,并最终成为“模式”与“规范”?

对此,莫莱蒂曾以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和同时期其他侦探小说为具体研究案例。他以这些侦探小说中的“线索”为核心要素,绘制出

了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的“线索进化树”,并且将其和同时代那些“大量的未读”的侦探小说进行横向比较,指出“线索”虽然是侦探小说中的形式装置,但其在不同侦探小说作品中的反复出现使其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叙事功能,而柯南·道尔正是因为善于运用“线索”这一形式装置,并充分发挥其叙事功能才最终从众多同时代侦探小说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取得文学市场上的成功。莫莱蒂的这一研究固然有其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他自己所一直批判的文学研究的封闭性之嫌,即他可能过于强调小说中的某一研究要素或特征,而忽略了影响小说获得市场畅销与影响力的复杂原因。比如埃利夫·巴特曼就曾批评莫莱蒂在这一案例研究中忽略了福尔摩斯系列小说获得成功背后的哥特风格、异域情调与惊险情节等丰富影响因素。

当然,关于文学类型的研究从来都不是仅限于文学内部,正如詹姆逊指出:“文类概念的战略价值显然在于一种文类概念的中介作用,它使单个文本固有的形式分析可以与那种形式历史和社会生活进化的孳生的共时观协调起来。”(《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即其认为“文学类型”因为其作品数量的集中性和形式特征的稳定性而成为“单个文本固有的形式分析”和“形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研究中介,每一种文学类型背后都承载着一套政治无意识,文学类型是我们借以把握时代症候的有效抓手。葛红兵教授在分析中国当代类型小说时也关注到了中国当代小说类型化趋势加剧的背后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小说创作类型的深刻化是经济市场化发展的结果,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社会的阶层化,社会的阶层化导致了文学审美的阶层化,审美趣味的阶层分化是小说创作类型化的直接动力。”(《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实践——小说类型学研究论纲》)

而具体到侦探小说的研究之中,将侦探小说与社会历史结合起来的考察必然绕不开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关系的思考。简单来说,侦探小说作为一种诞生于现代都市中的小说类型,其和现代都市本身有着密不可分天然联系。无论是本雅明所提出的诸如“人群中的人”“都市漫游者”和“惊颤体验”(Chock-Erfahrung)等精辟洞见,还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爱伦·坡笔下的巴黎、福尔摩斯生活的伦敦,以及民国时期众多中国侦探(霍桑、鲁平、李飞等)所居住并展开行动的上海,无一例外都是现代化大都市;或者是早期侦探小说中所呈现出的都市公共空间(拱廊街、汽车路、舞厅、酒店大堂)、现代交通与通讯工具(马车、汽车、火车、电话)以及新兴的犯罪和侦破技术手段(摄影术、化学检验)与现代都市感觉结构等等,都将侦探小说深深根植于现代都市的文化沃土与幻象感受之上,即如本雅明所讲的“侦探小

说尽管有冷静的推算,但它也参与制造了巴黎生活的幻觉”。而在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关系方面,莫莱蒂也做出了相当有趣且富有创见的个案研究。他受到查尔斯·布斯在《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1897年)一书中所附带的关于伦敦阶层分布空间与罪案分布空间地图的启发,指出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中案件频发的都市空间与查尔斯·布斯所绘制的历史上真实的伦敦罪案空间完全相反。具体而言,柯南·道尔笔下的罪案往往发生在伦敦西区,那里是富人区,而现实中罪案频发的地带则是位于伦敦东区的穷人区。关于这一小说虚构空间与现实空间情况的错位,莫莱蒂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现实中罪案发生的频次和密度显然与城市贫困和社会治安情况有关,这作为显而易见的逻辑并不具有任何神秘性可言。但在侦探小说中,犯罪行为必须具有神秘性,这才能够为侦探后来的查案和破案提供足够的悬念紧张和情节吸引力。因此,一起发生于富人家宅邸的谋杀案显然更具备这种神秘与耸动的表达效果。即在这个意义上,侦探小说不是对现实案件的还原和纪实书写,而是有着对案件本身“赋魅”的叙述需求。

其实,除了莫莱蒂已经作出的极富启发性同时也带有争议性的对侦探小说的“远读”观察和类型研究之外,还有很多值得用“远读”方法去尝试的有趣的研究题目。此处仅举两例:第一,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其除了自身有一套稳定的类型特征之外,还有着诸如“密室杀人”“暴风雪山庄”“叙述性诡计”等更为细致的“子类型”划分,而对于这些“子类型”小说的类型特征、核心要素以及时代症候意义的把握也可以借助“远读”的研究策略来进行整体性分析,比如对“暴风雪山庄”的地理空间设置与建筑装修风格的分析,对“密室杀人”案件中“密室”形成分类及演变趋势的分析等等。第二,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根据真实案件新闻即时改编而成的侦探小说或犯罪小说,有些甚至直接标明为“事实侦探案”,俨然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子类型”。而对于同一案件,新闻报道、侦探小说与定位在两者之间的“事实侦探案”各自有着怎样的侧重和不同的改编,受莫莱蒂关于福尔摩斯小说与伦敦罪案地图研究案例的启发,我们似乎也可以对二战后国民党城市治理失败与城市治安问题及相关文学虚构之间的关系和原因,提出一个新的观察和思考的角度。



(上接第1版)

长篇纪实文学《博格达来信》以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罕南里克镇马勒其村青年村民布合丽且木·奥斯曼到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上班后给家里写的三封信为主要线索,讲述了南疆富余劳动力转移再就业女性的成长经历。她们从南疆农村一路走来,在博格达峰下的乌鲁木齐开始了自己崭新的生活。

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将文化润疆作为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都要求我们推出更多的精品,凝聚文学力量,助力新时代文化建设。同心筑梦新时代,脱贫攻坚奔小康,新疆作协将继续抓好主题创作,组织各民族作家奔赴新疆各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多种语言推出更多精品佳作,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麦麦提敏·阿卜力孜)

第二屆黃姚詩會舉辦

本报讯 12月12日,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广西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广西黄姚镇旅游文化产业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黄姚诗会在广西贺州黄姚古镇举办。霍俊明、黄国辉、田湘、汤松波、金石开、叶景松等主办方代表以及诗人、评论家共30余人与会,围绕“生态文明与诗韵黄姚”的主题进行研讨。大家谈到,古镇连接着时间和历史,同时又承载着当代人的烟火。进行诗歌创作既要关注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文景观,也要注重个体生命经验和丰富的历史经验,这样才能写出优秀的诗歌作品。

其间举行了“黄姚诗会”主题征文颁奖活动。该征文自今年1月15日至10月1日进行征稿,共收到数千件投稿。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共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10后,优秀奖奖20名。袁沛、八零、万世长、李俏红、邱保青等诗人获奖。(欣 闻)

打造丰富多彩的芭蕾跨年盛宴

本报讯 在2020年临近岁末、2021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央芭蕾舞团为观众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芭蕾跨年盛宴,以艺术的形式献上辞旧迎新的美好祝福。

作为此次中芭新春演出季的开幕大戏,12月15日至17日,古典芭蕾舞剧《舞姬》在北京天桥剧场率先上演,艺术家们精彩演绎了这部世界芭蕾舞大师娜塔莉娅·玛卡洛娃钟爱的经典之作。此后,向建党100周年献礼的原创芭蕾舞剧《沂蒙》将于12月26日至28日首演,力求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重焕光彩。2021年1月2日至3日,芭蕾舞剧《过年》将在喜庆的氛围中带来浓浓年味。1月6日,一年一度的中芭《新年芭蕾舞音乐会》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与观众见面。2月4日至6日,中芭的庚子年压轴大戏《天鹅湖》也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除在北京的演出外,中芭的艺术家们还将携《红色娘子军》《鹤魂》《芭蕾精品荟萃》等多部佳作赴全国多地展开巡演。(王 觅)